

■新作聚焦

李修文散文集《致江东父老》:

在相逢中确认自我

□孙忞麦

《致江东父老》(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年9月)开篇有一只寻死的猿。它终日里都在忙着两件事:一是表演钻火圈、踩自行车、作揖和扮鬼脸,此为求生;而除此之外的其他时间,则是寻死。求生关乎性命,求死关乎尊严。而铁栅栏外与猿对视的那个人,正是李修文。猿像一面镜子,指认了李修文的双重身份:一个他,周旋于庸常的琐碎之中,为生计奔命;另一个他,作为写作者,整日思考的只有一个问题:如何真实地活着,作为一个真正的“人”。

写下“共情”,是为了报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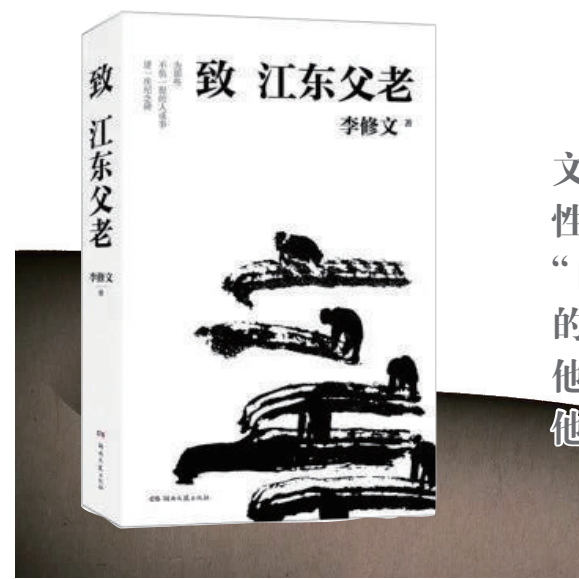
《致江东父老》延续了《山河袈裟》的思路,“人民”构成了李修文散文写作的资源和命脉:“我喜欢‘人民’这个词,它让我觉得明亮而堂堂正正,同时也饱含了情感,所谓‘同是天涯沦落人’——你沦落时所遭遇的友好亲朋可不就是你的人民吗?因此,喜欢‘人民’这个词汇,就是我的立场。”《致江东父老》仍然写于路上。这个“路”是字面意思上的路途,更是写作路、人生路。再进一步说,李修文写的是与他萍水相逢却又无法轻易擦身的“路人”。“人民”于李修文,既是来路,也是归途。写下他们,既是自救,也是报恩。

虽写的是小人物,李修文却写出了大气象、大格局。究其原因,却恰恰是因为这点:他承认“小”,承认人的渺小与卑微、平凡与愚昧——坦坦荡荡,不加掩饰:“如你所知,我仍未入流,十年前住的是小旅馆,十年之后,栖身的无非是另外一家小旅馆。可是,在十年之后的这家小旅馆里,我还是写下了这些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为不值一提的纪念。我知道,就算你泉下有知,它们,也仍然不值一提。”(《女演员》)他的“承认”,来源于他对他者命运设身处地的体察和感知,因为他时刻和那些小人物站在一起,柳暗花明之时仍不忘自己的来处,他才能真正实现“共情”,而非“同情”。

好的作家一定是个好的共情者。“共情”和“同情”,表面看上去似乎如出一辙,然而内里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前者是跳下悬崖,与受难者同呼吸、共命运;后者虽头顶苍天俯瞰众生,却迟迟不肯从山顶下来——他们止于“看到”。很大程度上,我们对一些散文感到乏味也正是因为如此,作品中情感与抒情主体是割裂的。它看似是作者的真情实感,但由于情感本身缺乏与作者之间的联结而显得空洞无物;或者再退一步,情感是真实的,但写作者缺乏对抒情对象的切身体认,从而使情感本身显得违和。即,不对等、不合适、不相配。

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好的共情能力是机遇,是天赋,充分主动的共情意愿是本能,是职责,李修文的写作是真实性情的写作,他的散文,首先是对事件与情感的真实记录,没有空泛浮夸的邀功,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也因此,在他这里,写作不再被作为一个宣扬真善美的工具,而还原了最原始也最本真的功能:表达。

真正的写作是和自己自己相认。在与他者的情感碰撞中,李修文的自我确认也得以完成。李修文强大的共情能力,使他者细微的情绪、感受在他笔下无处遁形。对于“他们”,他先感知,再进入;在独处之时,“他们”的感受、经历又全部回归他自身。他反刍、回味,以与他人心意的相通,形成勾连作品首尾的情感纽带,从而在书写者与书



写对象之间,形成了一种隐秘的对话关系。“他们”身上映现着“我”的过去,“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血肉的一部分,写下“他们”,也就是写下“我”自身。

这样的写作背后更深层面的逻辑关乎作家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人”:“我们都得把一个‘我’字从自己的身体里请出去,人这一世,之所以可怜,就在一个‘我’字。把‘我’去掉,看自己,就像看别人;看畜生,就像看菩萨。”(《我亦逢场作戏人》)通过破我执,承认个体的普通,它抵达了“人”更深层面的普遍性。也正是因了这“情”,李修文的“自我”得以确认。而那些与他相遇的“他们”,不是他面前的雕塑,不是他笔下的肖像,李修文亲切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同路人。

以情感铸就“场景感”

作为一个情感表达相对直接的文体,情感对于散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何运用、呈现好情感,于写作者、于文本本身都绝非易事。

一方面,情感表达的直接性大大降低了散文的写作门槛。写作者的情性和散文本身的扁平化特征,使这一文体内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使得散文的美学功用被大大低估,这一文体自身的发展也长期止步不前。另一方面,情感表达的直接性,也常将散文写作者置于尴尬之地:情感过于克制,则力道不够;情感过于泛滥,又难免矫情,使文章流于作者的自我感动。“小人物”的主题和抒情性这两大特点加在一起,如何将平凡主题处理得不落流俗,对写作者来说就更是不易。

“面临散文写作,我有一个很大的执念:我想我的写作不归于真实,甚至不归于现实,它应当是归于美学的——美学才是目的,所有的组成部分只是通往它的驿站。”(《对内心与世界的尊重》,《天涯》2018年第3期)“在我看来,文学最终考察的是一个作家对世界的综合把握能力,你必须通过努力使笔下的世界具有均衡与充盈之美,在这个意义上说,枪炮与玫瑰同等重要。”(《写作和我:几个关键词》,《小说评论》2009年第4期)在散文

通过破我执,承认个体的普通,文学抵达了“人”更深层面的普遍性。也正是因了这“情”,李修文的“自我”得以确认。而那些与他相遇的“他们”,不是他面前的雕塑,不是他笔下的肖像,李修文亲切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同路人。

写作的美学追求方面,李修文有着绝对的自觉。因此,与众多以“情感表达”为内容的散文的“内向”特征不同,李修文的散文是“向外”的。他的散文具有更为开阔的面貌,他的写作发生在路上。

李修文的写作是具有场景感的写作。“场景感”意味着声光电,意味着可触、可观、可闻,它不是落在白纸上行行分明的黑块,也不是平铺的二维画面,而是动态、紧凑、活生生的一部电影、一台戏,是一场多维、立体的感官盛宴。“场景感”是“画面感”经由作家内在情感熔炼的结果。作为写作主体的李修文可被视作一座“移动的火山”。在横向上,他奔波于路途之中,不断和“他们”发生关系;在纵深处,他的情感、思绪、经历的人事也在不断地汹涌、缠结,在滚烫的胸腔四下里碰撞。以画面为缕,以情感为线,这力量经由李修文的消化,被注入他笔下的画面中,使他的散文具有了强烈的感官冲击力。

但是,每每汹涌的情感即将喷薄而出之时,李修文住口了。有的作家仅凭感性和天分写作,灵光乍现的时刻像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迫不及待地想把它用出去。李修文不。他明白写作绝不仅是情感的宣泄。如果将情感比作水,将写作比为以水发电,他明白瀑布的能量绝对比溪流大得多。

比起滴水穿石细水长流的温吞,李修文选择先“修坝”。他像猎人般蹲下、潜伏、观察,让情绪慢慢沉淀,循环往复的锤炼,赋予了李修文的文字质感和密度。也因此,他散文中的情感因其恰到好处克制而更像是沉寂在火山中数百年,终于承受不住压力喷薄而出的岩浆,它充沛而不泛滥,有重量,有后劲,耐琢磨。

常有人将人生比作攀岩,千军万马冲锋在前,登上高高的顶峰,以飘扬的旗帜证明尊严。但仍然存在另一种可能:是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停下,是在攀爬中将那具名叫废物的皮囊一点点撕开,是看见自己的命运“穷愁如是,荒寒如是,但是,自有万里江山如是”,是将骨头变成石头,再在沉默的铸造里重新做人。

人生苦短,写下便是值得。作为写作者的李修文,为的就是这份值得。

■创作谈

我看见过春天的黄河。其时东风浩荡,冰花碎裂,所有的浊浪,与苏醒无关,与崭新的命运无关,如同每一年的此时,它们时而化作狮子吼,时而转为掐住了高音的低音,最终,就像在世上逃难的母亲,它们吞下了苦楚,遮掩了伤痕,携带着仅剩的儿女奔向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远方。

是的,在滔滔东去的大河里,有高音,也有低音;有山东,也有山西;有坚硬的黑铁,也有消散的浪花。多么像我们置身其中的人间:深山里的雪水还没有化开,独木桥上的人正在淌下热泪;冻僵的手会攥紧一只馒头,大风里的腿脚终于向前迈了一步;自取灭亡的人不发一言,苦水里浸泡过的心却偏偏不肯被驯服。

在春天的黄河边,当我回过头去,看见渡口上长出的花,看见更加广大的人世,不由得再一次决下了心意:那些被吞噬和被磨蚀的,仍然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起来;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筑而成的纪念碑。

行路至此,他们早已不是别的,他们是头顶的明月,是正在长成的胎记,是有脸没脸都要再见的江东父老。

致江东父老:为了配得上你们,我要变得更加清白,那些廉价的号响,那些似是而非的口号,我要代替你们去推开它们。这纸上的河山,要做生死账,更要做招魂簿,生老病死,春雨秋雨,稻浪麦穗,披红挂绿,以上种种,要聚集,要忍耐,要被召唤,而后水落石出,最终迎来光明正大;我也要变得更加沉默,不再执迷一己之力的奔突之声,而是拽紧了你们的衣角,跟着你们去世上,由此,让浮泛的变成实在,让自诩的托付变成一场不闻不问的盟约。

就像我所写下的这些篇章,踉踉着来了,趑趑着走了,许多时候,我都不知道它们究竟姓甚名谁,微末的盼望,是眼见它们做夜路上的好汉,看待自己,就像看待一场奇迹,再一路狂奔,来到了风雪山神庙,是的,水穷处,云起时,一篇文章,即是一场风雪;一篇文章,即是一座山神庙。正所谓,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这些儿郎们,如有为难,你们就做哪吃,割骨还父,割肉还母,只顾去抱紧那些扑面而来的面孔和遭遇——如此大的天下,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可爱人,这么多的可怜人,到头来,不过是: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既然如此,儿郎们,莫不如在召唤声里应声而起;上天也好,入地也罢,他们去哪里,你们便去哪里;他们要你们变成什么样子,你们就变成什么样子。

如此大的天下,这么多的人。我已经写下了不少,但还远远没有写够,就像行走在一条永无穷尽的长路上,越写,越觉得自己一贫如洗;越写,越觉得莫大的机缘正在临近,一草一木全都变作了江东父老。

所以,再致江东父老:道路正在继续,更多的沟壑烽烟正在朝我奔涌,而我的心意已经决了,一如收集于此的这些篇章所写,油菜地里的,荒寒的窑洞中,又或东北小城,西域戈壁,以上诸地,在明处,在暗处,全都倒伏在地的人,要我说,他们其实也是一座座倒伏在地的纪念碑,但凡想要将他们搀扶起来,这纸上的河山,就断然不可能画地为牢,相反,它要伸出手来,去触摸牛蹄窝里的这一块苦,也要去吞噬针尖上的一点点蜜——这些触摸与吞噬,不是觉悟,而是命运;这些苦与蜜,不是自说自话的弯弯绕,而是拼尽了性命才能靠近的大初有道。

是的,一定要记得: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事,建一座纪念碑;一定要记得:天下可爱人,都是可怜人;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

■评 论

烟火气息中的时代情怀

——读《星星亮晶晶》 □郝江波

“诗人和哲学家、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在一种意义上是他们时代的创造者,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是他们时代的造物物。”借用英国浪漫诗人雪莱的这句名言来描述中国网络文学颇具意味:一方面,网络作家是推进IP热潮、网文时代的创造者,同时,网络文学本身又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产物,它为五四文学以来的“民众书写”和“书写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为中国现代文学“大众化”与“化大众”两难命题打通了一扇门。

网络作家天下尘埃的长篇小说将笔触聚焦文学作品鲜有关注的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深刻呈现了病患儿家庭的生活之殇和精神之痛,同时又以自闭症孩子母亲的视角和经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这一特殊群体从逐步认知了解到日趋关注、关怀的暖人画卷。文本中对家庭困境、工作压力、世态冷暖的拷问与对完善社会救助治疗制度的呼唤让人掩卷深思,而主人公坚强面对生活困境,用母爱和坚强与命运抗争的精神则让人振奋感动。作者希冀用自己现实关注的视角和真善美的文字呼唤社会为自闭症患儿和家庭提供更多的关爱与帮助,整部小说呈现出深厚的现实情怀和社会责任意识,鲜明反映了新时代文化语境下网络文学扎根现实土壤、厚植时代精神的突破与方向。

从2005年以来,天下尘埃一面以《风向何处吹》《苍灵渡》等古代言情小说获得大批网民的喜爱,一面又不断调整拓展自己的写作路线并积极与传统文化界交流,长篇小说《星星亮晶晶》正是其扎根时代精神、转向现实题材创作的重要成果。天下尘埃其人其作的发展不仅是一名网络作家追求与突破的个案,更是诠释理解中国网络文学成长历程的典型案列。从最初的表达内心情绪的野生野长,到阅读点击的娱乐商业模式,再到风生水起跨界运营的IP热潮,中国网络文学历经20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网络文学的实力和影响已得到中国文学界足够的重视和认可。而就读者层面而言,受众群体日趋广泛,广大网络读者的口味和品位也日益提高,玄幻怪怪、修仙升级、穿越言情等的作品已让读者感到了审美疲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内外驱动下,向现实题材转向寻求更广阔、更深厚的文学资源成为越来越多网络作家自觉的选择,贴近现实题材、扎根时代精神、担当社会责任成为网络文学发展的必然之路。

在网络文学向现实题材转向突进的潮流之下,《星星

亮晶晶》最突出的美学特色则在于其“平民大众的烟火气息”,它无意书写时代史诗的“雄心”,而是以作家的悲悯情怀选择文学鲜有触及的自闭症儿童题材,沉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之痛和普通小人物内心甘苦中,去展现时代生活的真实,引领读者去关注思考社会与生活的问题。近年来,网络文学向现实题材题材的队伍日趋壮大,以《大江东去》《大国重工》《浩荡》等为代表的一批现实题材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恢弘主题和文学大义,成为网络文学突进现实题材、张扬时代主题的重型武器。而这部27万字的《星星亮晶晶》则更像是狙击枪,细腻、准确而贴近普通人悲喜交加的日常生活,与大主题作品共同充实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宝库。作品以简洁白描的语言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详实记述了自闭症患儿母亲郑芸从怀疑、诊断儿子病症,到背负精神、物质压力多方求治终有起色,进而成为救助社会患儿的志愿者的故事,如摄像机般记述了这位母亲焦虑、心碎、挫折、坚忍的心路历程,在医院就诊、公司请假、夫妻吵架等一个个日常、琐碎的生活画面中,融注了作者对人物的关注、同情与希冀,于平静记述中感人至深,而读者还能依稀从中见证到自身生活的倒影和共鸣。

如果说敢于选择尚未被社会重视却给当事家庭带来毁灭性创伤的自闭症儿童题材,体现了作者的责任和勇气,那么大众烟火气息下的温度书写则更呈现出作者一直以来细腻、丰富的美学风格。而其中对实验幼儿园看门大爷、幼儿园老师等人信手拈来的传神描写所传递出的现实批判也为作品增色不少。从这一美学特征着眼,《星星亮晶晶》呈现的不是大江东流般浩荡雄浑的史诗气概,却如一脉溪流曲折流入海,真实展现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苦难和温度,在丰富、补充新时代网络文学画廊的同时,为反映和建设新时代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镌刻下自己真诚的一笔。

突进现实题材潮流给网络文学发展带来了新机会,也显示出网络文学强大的生长力,但网络文学自发性的特征也提醒我们,要警惕现实题材网文井喷的泡沫化:题材雷同,文字粗糙,思想贫乏,缺乏艺术个性,甚至形成新的类型化、同质化困境。网络文学向现实题材的成功转型,关键还在于网络作家立足时代精神、强化社会责任,深入现实不断拓展题材领域和美学空间。在这方面,《星星亮晶晶》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新作快评

马小淘中篇小说《骨肉》、《收获》2019年第6期

一个彻底的姿势

□王朝军

《骨肉》一张口就说:“我十二岁那年,我妈妈和我亲父亲私奔了。”小说中,妈妈抛弃了“我”和爸爸,而这个“我”叫了12年“爸爸”的人竟不是“我”的亲生爸爸。更难置信的是,妈妈奋不顾身投奔的正是那个血缘上的爸爸。很明显,马小淘选了一个偏僻的角度,她只是轻易地调换了两个男人的角色,事情就变得复杂而新鲜起来。面对眼前这个本不是爸爸的爸爸,“我”将何去何从?这个名义上的爸爸是否还会接纳“我”?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是在这个不确定的基点上,小说向读者敞开了它的可能。

这场“私奔”惊世骇俗,没有旧例可循,像一个恶毒的玩笑,从一开始就驱逐了人类经验中有关私奔的所有细节。当事人被逼入前所未有的绝境,他们必须小心翼翼,在妈妈“私奔”后的残砖剩瓦中清理出一条新路。这显然是有难度的。一对无生物学亲子关系的“父女”,纵想一仍其旧,也必将在时光和无穷的琐碎生活中遭遇重重阻障。

马小淘无意重复一段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庸常剧情,尽管她已为这个剧情预设了新的高度。我以为,马小淘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道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道德的“解释”。尼采在《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中说:“根本没有道德现象这种东西,只有对现象的道德解释。”我的理解是,道德绝非自在之物,它必得落到人间,经由人的生活来体认、衡量、求证。所以,面对“妈妈出走”的既成事实,父女俩的疑惑惊人地相似:道德的尺度究竟在哪里?如果妈妈被指认为是不道德的,那么“我”和爸爸就是道德的吗?这里是否有个陷道德于尴尬的中间地带?在这个地带,道德虚弱无力,不堪一击,随时都有塌陷的可能。

我确信,马小淘在这个问题上是为极犹豫的。这种犹豫落实到文本中,就是对张老师(爸爸)和张涵(“我”)二人道德体验过程的冷静述说。此时,在她的眼里,作为主体的“我”和爸爸已被悄然置换为客体形象:张涵和张老师。在私奔事件中,张老师是当然的受害者,但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道德天平的另一端,就会发现:张老师对妈妈的爱并不纯粹,他之所以和妈妈结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可以合法地、近距离地欣赏她的美”。换句话说,促使他不顾妈妈肚子里怀着别人的孩子而甘愿“接盘”的动因,仅仅是出于

收藏精致“艺术品”的本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逃过死劫后,他那么急切地要去欧洲欣赏真正的艺术了。这或许是丢失妈妈这件“艺术品”的心理补偿?听起来有点残忍,可谁能说就一定不是实情呢?更残忍的实情是:他们在12年的婚姻生活中,只不过是对方功能性的代用品。张老师是刘雨刚(张涵的生父)的替身,妈妈则沦为张老师心目中艺术的完美修辞。倘若上帝真的存在,恐怕他手里的道德权杖也知该挥向何方。

道德的复杂性正在于此。当我们提及道德时,常常会自命为“上帝”,俯视芸芸众生的每一处伤口。但我们不是上帝,我们被牢固地吸附在大地之上。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也就廓清了人的限度和边界。对此,马小淘是清醒的,甚至是冷酷的,她知道在张涵的周围遍布陷阱,她必须植入自己的声音,一种不同于张涵的声音,一种充满焦虑争执的声音。

这是书写者的“我”对叙述者的“我”的精神空间的介入和干扰。马小淘不会不清楚,这种干扰是危险的,稍有不慎就会剥夺人物行动的主权。但她又是矛盾的,潜意识告诉她:道德从来不能自证,要想收获真实的道德体验,就必须走入人群,交换彼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者的声音不仅不是多余的,反而从内部丰富了张涵的精神维度。张涵的道德体验便是在矛盾丛生的秘密冲突中逐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绝对的孤独和怨恨得以消融,生命也随之阔大、庄重。一切顺利,这下道德的阴霾应该烟消云散了吧?不,问题出在父女俩的欧洲之行。正是这趟对张涵来说“如同噩梦”的旅程,让他警觉地嗅到某种“阴险”的气息。爸爸,这个在道德面前始终保持沉默的“好人”突然性情大变,一路上疯狂地挥舞起道德的戒尺。人性中还深藏着多少隐秘?也许道德可以体验,可以解释,但所有的道德解释,在人性的宇宙面前终究是微不足道?

这一疑问,在小说结尾处得到了有力的回应,并凝为一个彻底的姿势:“掌上明珠”。马小淘一手策划了这场善良的阴谋。她孤傲、机警、善变,在她冰蓝色的想象世界中,张涵其实并没有走远,她一直都在,在爸爸湿润的掌间,在宇宙每一点的中心。

像行走在一条永无穷尽的长路上

□李修文